大杂院里的『五行八作』

林希

传统行业，五行八作，大抵包括了平常百姓从事的各种行业。大杂院居民全是劳苦人，他们从事的职业全在五行八作之内。何谓“五行八作”？“五行”：车行、船行、脚行、商行、牙行。大杂院里的男人，前三行的居多，至于那个“商行”，不敢当了。

天津人说“商”，要有店铺，俗称“门脸儿”，还要有个“字号”，所谓坐地行商。有门脸儿、有字号的，必然还要有自己的住处，每天背着大包袱走街串巷卖布头、卖洋袜子，不敢自称为“商”，那叫做小买卖的。

“牙行”，生意场中的中介。旧天津时，称为“跑合儿”的。“牙行”始于秦汉，盛于江浙。在生意场，买方卖方，不便直接接触、传递信息，你想买什么东西，他想卖什么东西，先找到“牙行”，请“牙行”摸清情况，有了卖方，再找到买方，双方接触，不能当面讨价还价，还要请“牙行”出面，讨价还价是一桩一分钱不让的无情交往，谈不拢伤感情，由“牙行”出面代理，经过一番周折，双赢，生意做成了，大家都欢喜。

“牙行”人士，要的是身份，衣着体面，文质彬彬，那时候没有私人汽车，但“牙行”人士大多有私人包月的胶皮车，天津人称之为“包月儿”。从车行租出一辆胶皮车，雇用一个拉车的人夫，只拉自己这辆胶皮车，就等于现在的私家车。现在的经纪人出入“打的”，没面子，没有人和你谈生意了。

大杂院里的男人，没有资质从事经纪人工作，背个大包袱走街串巷卖布头，也用不着经纪人。如此，“五行”职业，大杂院就少了商行、牙行这两行了。

没有了商行、牙行，剩下的三行中，船行，以船为家，大杂院的船行，只是在河岸拉船的纤夫，基本上属于脚行。早年间的天津脚行，有“散”脚行一个分支，散脚行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，也就是不被脚行把头控制，自己找零活儿，被把头雇用的脚行，大多集中居住，一是为出工方便，二是受集体保护，脚行之间常有争执，严重的更有“过节”，住在大杂院里容易人单影孤，遇到仇家就要吃亏。所以，大杂院里的脚行人家也不多。

大杂院里的男人做零活儿，糊口谋生，归于“八作”范畴，何谓“八作”？生意场外的手艺人，如金匠、银匠、铜匠、铁匠、锡匠、木匠、瓦匠、石匠，俗称“八作”。

“八作”不包括读书人，老师、小报记者、代写书信，反正就是读书识字者辈，大杂院里也不为多见。旧时，天津“五行八作”之外，还有不成文的一行，被称作“打八叉”。

“打八叉”

上世纪50年代，老舍先生话剧《龙须沟》里，有一句名言“五行八作里没有你这一行”。说的就是天津人的“打八叉”。

可能北京人的“没你这一行”和天津人的“打八叉”，还有区别。到底天津人的“打八叉”是干什么事由的，一言难尽。

先要说明，“打八叉”属于正当事由，绝对不是不良行当。旧时代，社会秩序混乱，坑蒙拐骗无处不在，这和“打八叉”无关，再等而下之，讨饭也不在“打八叉”之内，现在说的不偷不抢不要饭，不给国家找麻烦。这就是“打八叉”的底线。

我过去在工厂劳动，接触过许多底层社会的劳动者，其中许多就是旧时代靠“打八叉”养家活命的穷苦人。后来我写了一部话剧，说到“打八叉”，我的解释是：“什么不是人干的活儿都干，什么不是人挣的小钱都挣，什么不是人受的气都受。”这就是“打八叉”人等的生活感受。

“打八叉”，生计无着，天亮睁开眼睛，不知道今天应该去哪里找饭辙，反正不能在家里呆着，天上掉不下来馅饼。走出家门，来到“三不管”，一个人卖什么生疏东西不开张，凑过去，帮助吆喝：“带钱的，你算来着了，买吧，买吧，百年不遇，原来云南进贡的珍品，天津人开了眼啦！”一阵吆喝，开张了，越吆喝越来劲儿，吆喝一天，不开张的买卖，窝在手里的东西抢购一空，能不得点酬谢吗？第二天的饭有了，今天晚上的二两小酒也有了。

遇见卖洋袜子的小贩，刚放下大包袱，才要吆喝，“打八叉”人士一步抢上前来：“哎哟，大哥，你怎么几天没见，十天之前买的您老那双洋袜子太好了，商店里卖的线袜子，三天露大脚豆儿，您老这双洋袜子，半个月洗洗新的一样。老街坊们打听哪儿买的，我跑了好几天没见到您老的影儿，今天可碰见您老了，先给我来二十双。”

“哎哟、哎哟，不行，今天没带这么多货。”这里正在争执，逛“三不管”的人围上来了，你一双，我一双，全都抢光了。当然，明天的棒子面钱挣到了，二两小酒也有了。

天津人说：“惹惹一天，两块二三。”靠“打八叉”养家活命，也是一条生路。

我的一篇小说《找饭辙》，说有一个人，要本事没本事，要手艺没手艺，要力气没力气，“打八叉”。晴天，马路上帮助人推车、拉小车送货，老地道下坡危险，帮助保护，上坡要力气，就帮助推车，忙乎一天，也养活一家人。

连推车的力气都没有。一个人逢到下雨天，南门外地处低凹，马路上积水，下电车一脚踩在积水里，好好一双新鞋毁了。“打八叉”者就将几块方砖放在积水里，下电车的人踩着水洼里的砖头走上边道，一分钱，一场暴雨，马路积水几天不退，棒子面钱又挣出来了。

喝小酒

晚上，大杂院里的男人们下工了，他们洗洗身子，换件干净衣服，晚饭未熟，门前摆上板凳，再一个小板凳，没有小板凳，就摞上两块砖，各家男人们相互打过招呼，各自摆好自家的小酒壶，没有酒壶摆上一只杯子，偏您了，吱吱吱，各自吮口小酒，其乐无穷。

大杂院里的男人们，每天晚上喝小酒，是天津卫一道生活风景线。一大杂院里头喝小酒，还有规矩。何谓喝小酒？喝小酒，酒量要小，至多二两，而且速度要慢。二两小酒，要喝一个小时，一口吞下去，坏了老少爷们儿的规矩。小毛孩子，叔叔伯伯面前，充大尾巴鹰，没人管你，你老爹会出来，一个耳光，把你扇回屋里去。

而且只能喝散酒，从小酒馆打来的散酒。原瓶装的品牌酒，那时候没有茅台、五粮液，最高等级的是直沽高粱，就算你有钱，买了一瓶直沽高粱，也不能一次喝光，至少要喝五六天。坐在大杂院里，一晚上喝净一瓶直沽高粱，你跟谁怄气吧，一定有人往多处想，你一口气喝光了一瓶直沽高粱，明天就有人搬来一个大酒桶，和你叫板，有胆量的你出来，十斤老白干，你半桶，我半桶，尿了，跪地上磕头，收你做个干儿子。

这叫戗火。

大杂院里的男人喝酒，就到小酒馆去打散酒。那些开在胡同口的小酒馆，备有两种酒，一毛七一两的是高等酒，一毛三的是普通酒。大杂院的汉子，因酒的等级不同，分为一毛七哥们儿和一毛三爷们儿两大阵营，前者多是年轻人，后者便都是六十岁往上的老年人。

女性专属时间

男人们二两小酒喝罢，再吞下一盆面条，或者是五十个水饺，时近9点，老九奶奶出来，一声吆喝，哥儿几个、爷儿几个酒足饭饱，该遛遛弯儿消消食去了。于是，大杂院全体男性居民，一个个走出院门，或去河边观景赏月，或坐马路边儿上，听商家摇留声机放唱片，《武家坡》《借东风》，马连良、梅兰芳，好不其乐无穷也。

男人们走光了，晚上8点半之后，大杂院开始了女性专属时间。

仲夏三伏，溽暑难当，大杂院里更是一团湿热，活活就是一个大蒸笼。女人们劳累一天，里外衣服早被汗水湿透，一次次贴在身上，好不容易盼到晚上风起，最高的享受就是洗洗身子，坐在院里挥动大蒲扇，全身放松，回味回味做人的幸福。

只是大杂院属于男人的天下，哪里有避人的角落放心地洗洗换换。于是，老九奶奶想出个办法，晚上8点半，是全大杂院净院时间，把男人们轰出去，留出女性专属时间，实现“女权社会”。

当然，也有潜规则，念书的学生晚上需要复习功课、写作业，还是读书重要，小学生晚饭前将作业写完，真有了读中学的秀才郎，留在房间里，背向窗子，潜心读书，据说这种环境中读书效率最高，那才是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了呢。

一个问题，大杂院没有院门，冷不防闯进来一个愣头青，怎么办？不要紧，老九奶奶早有安排，男人都走了，老九奶奶请出一位行动不便的大爷，搬个板凳坐在院门外，有人来，找谁，河沿儿凉快去了，到河沿儿喊一嗓子，他就答应了，如此这般，行动不便的这位大爷，就成了大杂院的义务门卫。

入夜10点，男人们陆陆续续地回来，一人一盆凉水，脱光膀子，稀里哗啦，一阵扑腾。老九奶奶又出来，将门外把守的大爷搀扶进来，沏一壶热茶，刚才的义务门卫半躺在躺椅上，又是一幅其乐无穷图也。

麦场

李耀岗

摊了一场麦子，白花花的，像白花花的汗水汇成的一片麦海，大半年来的辛苦似乎都搁在这儿了。李家巷最性焦性躁的兆泰老汉，正在扯着嗓子满场吼着：耍歇了，耍歇了，起场了，起场了，没时候了，没时候了……

他每句话几乎都要重复两遍，以示重视，也是强调。但凡涉及干农活的事儿，没一样不是他不看重的，他好像天生就是为农活而生的，干瘦、黝黑的脸上只有两撇八字胡须是白的，像场子上拥麦用的榆木推板向两边叉开的两条腿。兆泰老汉的勤劳、性急、暴躁是村里有了名的，总是永不停歇，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也总是有干不完的活。队里新嫁过来的年轻媳妇都怕跟他干活，这哪是干活啊，简直是在拼命。兆泰老汉的最后时刻，也是殁在给地里担粪的路上。

现在，离他挑最后一趟粪，还有几年的时间，他毫无察觉，依旧奔忙不止。在我们这个村东的生产队里他几乎就是“场”长，那是他的主场，凡进了“场”的人除了队长都要受他管，被他吹胡子瞪眼时时催促，被他一阵急似一阵的吼声淹没，像打仗似的。我们这些小孩子是不会让进“场”的，只能偷偷溜进或是在外面观看，远远地听他打雷似的吼声，看见牛马拉着碌碡在摊开的麦秆上一圈一圈碾着，干热的气息和麦草、麦粒的味道，在“场”上弥漫开来，又冲出“场”外，激荡口鼻。这是麦村一年一度收麦的尾声，人们的疲劳大约也到了最后的极限。不过，闻到新麦的香味，再忙再累也是值得的。

集体生产时期，每个生产队至少拥有一块打麦场，简称麦场，晋西南人直接称之为“场”。印象里的“场”，始终是一处极豁亮开阔的平地，如古时演兵的校场或阅兵的沙场。场的宽敞、平整，是经过精心维护了的，名曰硌场。水滋润过的场土酥软，可塑性强，撒些碎麦秸和麦衣，牵来老牛，套上石磙，一遍一遍轧场，直至出落得一个平整光滑的场，就是硌场。我们小时候学骑自行车，大都先在场上斜跨熟了，才敢大胆腿搭车梁骑上大路，那场地平得跌倒都不觉疼。年轻小伙子打赌角力摔跤，一般也选择在“场”，这儿空间大嘛，摆得开，再说若是力气实在使不完，还可以就地搬起几百斤重的石碌碡走一趟。碌碡，这玩意原本是农村碾麦用的，过去能搬起的大有人在，现在的人怕是挪也挪不动了。

麦场之大，大在空间和胸怀。每年麦收时节，这里都吞吐着全队的麦子——麦穗和麦秸，以麦个子的形式簇拥而来，也是麦子全须全尾最后庄严的形式。很快，它们就在这儿被分成了麦秸、麦粒和麦衣。全村男女老幼，都围着麦子转，也牵牛驾车在各自的麦场碾着麦子转。最后，麦粒晾晒在麦场，最好品质的成为公粮，一粒秕麦都没有，留给自己的成为口粮，需要精打细算才够吃一年。麦秸垛子被一杈一杈累积在场子四周，像一个个蘑菇状的硕大的堡垒，晋西南人习惯称之为穰积（音jian ji）。我知道当年那些偷情的男女，也会把这儿当成他们的私密会所，在顶着几根从穰积窝里粘身的秸秆爬出麦垛前，没少干地动山摇的好事，像《白鹿原》上黑娃和小娥，被麦香迷醉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野合。一个巷子里的胜强比我们要大，心思缜密，手脚利落，曾在麦垛子下捡了枚鸡蛋，白花花得令人羡慕，不知谁家的傻鸡憋不住漏蛋，把这儿当自家鸡窝了。后来，我时时注意穰积里的漏蛋，却从来一无所获。

场，全称碾麦场，为麦而生，专场专用，围绕着麦场的许多劳作也深深烙上了“场”的印记。除了前述的“硌场”“起场”“碾场”外，还有“摊场”“翻场”“扬场”“扇场”“扫场”“赶场”“搅场”，主场在“场”，主角是麦，道具有碌碡、磙子、扇车、木杈、木锨等，所有能干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场上为麦而忙。这是最后的时刻，一年辛苦收获的最后时候，也是麦子兑现回报的时候，大家无疑都是忙而开心的，也是我见证过的最忙碌而热闹的晋西南农村劳动场景。许多过来人怀念生产队的那些事情，其中就有那时集体劳动大家可以穷开心，干活不耽误说笑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、大姑娘小媳妇，干起活来就渐渐松了正形，打情骂俏算个啥，着急一帮老媳妇敢把老汉小伙子裤子当场脱了让你裸奔。后来，散社分场，一个大场被几家一小块一小块“瓜分”，几家人伙着干才能撑起各自的“场”子来，集体的味道依然还有，那种忙而愉悦的气氛始终在“场”。有时候，赶场误了饭点，当家的一时兴起会买点心慰劳大家，麦子就摊在眼前，收获总算有了保证，人们也比先前变得慷慨。后巷的老姑夫曾开玩笑说这点心吃的，点心纸攒得都可以烧炕了。

最近看到一段麻雀啄食青麦的视频，始觉一年麦收时节又至。有人在视频评论区留言，说这鸟当年列入“四害”，看来也不冤它。其实，作为重要产麦区的晋西南，麦子似乎并不怕鸟雀祸害，好像从来没见过谁在麦田里立着假人吓鸟，谷子地就有，鸟雀成群成群地赶也赶不走。麦子成熟后最怕的还是天气突变，或为雨，或为雹，或为风，风旋后的麦地麦子倒伏严重，几乎像被碾过一样，刈割起来也极其困难。每年麦地里因风倒伏的麦子，都是我妈承包慢慢去割，整个人大概需要坐或蹲在地里，才能支撑起这样的细致而繁重的劳作。刈割不及时，麦子还会因干燥脱粒减产，或者因贴地湿热而发芽，那种局面真是令人绝望而悲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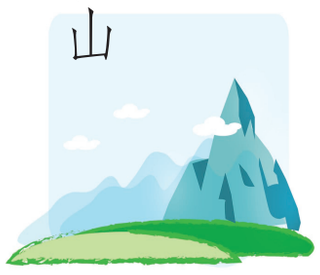
最怕的还是下雨，收麦的另一个形象称呼就是“龙口夺食”。从行云布雨的龙嘴里抢收麦子，足见雨水对收麦的干扰极大。我妈总说，什么时候麦子都回场了，就放心了。在妈心里，“场”算是麦子一处安稳的怀抱，像我们晚上疯回来躺在自家炕上，仿佛诸神归位。其实，回“场”的麦子，并不见得就是绝对安全的，也怕水火无情。农民的苦处就在于已经看得见的收获，也并不一定就是自己的，转瞬之际横遭变故的事儿多了。某年夏收，我们家的麦子刚刚碾毕进屋，大雨就追着屁股来了。侥幸躲过的人，正在庆幸有惊无险，看见邻家的麦子正摊了整“场”要被雨淋，心里不免又沉重起来。虽然已经包产到户“单干”了，但人心竟也没有散尽，大家急火火地一起上手，才把他家麦子救了回来，不然雨一浇，因雨再歇几天，麦苗都能长出来了。据说，真的浇了雨的麦子，在淫雨霏霏的连阴日子里，也只好马不停蹄赶快铺在炕上烘烤了。我没有见识过，但夏日雨天烧炕焙麦，该是多么魔幻而辛酸的一个场景啊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，麦场仍然维持了一阵子，随着联合收割机等刈麦方式的彻底改变，麦场终于失去了用场。当年队里最大的一块麦场，最终像切豆腐一样被划拨给各个添丁之家做了宅基地，消失得不留一点痕迹。许多年走过来的麦场从此失势，几无踪影，连农村生活标配的麦垛子——穰积，也淡出视线。只有那些刈过的麦子、扬过的麦子、碾过的麦子、晒过的麦子，扇车底下被父亲满意地装进麻袋的麦子，喂进磨面机麦兜里的麦子，一粒一粒装进粮站巨大粮仓的麦子，像远去的金色时光，仍然在记忆里闪着不息的微光。恍惚间，我亦如当年赤脚走过麦场，满场的麦粒铺垫如毯舔舐得脚底发痒，手握麦穗的孩子，额头洇着汗水，被日光晒出通红的脸庞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走近太白山

张映勤



从旅游的角度看，中国的名山大川确实不少，遍布全国，数不胜数，山如人面各不同，每座山都有自己的特点。得知此行的目的地是陕西太白山，心中疑惑，这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这些年，各地新开发的旅游景区很多，一座山够得上一定规模的，大多辟为景区招揽游客。偏于一隅，孤陋寡闻，我对太白山还一无所知，匆匆忙忙中便赶往了西安。

从咸阳机场到太白山下的汤峪镇，开车要一个多小时。一路上，我一直在琢磨太白山这个名字。山以人名，人以山显，中国的名山讲究的是人气，这座山也许和诗仙李太白有着某种联系吧。接站的姑娘是当地管委会的工作人员，路上便开始介绍太白山的来历，说是最早称作太乙山。我心中一动，这就对了，道教的洞天福地，这名字我是知道的。我以为，太乙的名字更古奥拙朴、蕴藉含蓄、典雅别致、不落俗套，有琢磨头，太白山则有些直白，也许是为了旅游的需要，迎合今人的口味吧。后来才知道，太白山的名字叫了近两千年，夏商时称“惇物山”、周代称“太乙山”，到魏晋的时候就开始称太白山了，这和几百年后出生的诗仙李太白扯不上任何关系。

太白山的得名，有两种说法，一是说山上常年积雪，有“太白积雪六月天”之称。古历六月，今之七月，正是炎炎盛夏，一年之内，山上白雪皑皑，常年不化，银光四射，故有太白之称。另一种说法是和太白金星有关，这颗天上最亮的太白金星，亦名启明星、长庚星，是道教的神格化人物，传说他在此修道成仙。这种有关名山大川穿凿附会的传说，信不信由你。

太白山也算是历史悠久，其名气却不是很大。到过陕西的人都知道秦岭，太白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，名气还远不如临近的终南山，终南山也是秦岭的支脉，距离太白山不过百里，是道教的第一洞天福地，隐士众多，传说纷纭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终南山修仙隐居的高道闻名遐迩，天下皆知，而太白山却像养在深闺的处子刚刚走入江湖，让人识得它的真面目。

游太白山是很难步行的，从汤峪镇的入山口，到终点停车场上板寺，要经过四十多公里的盘山路，费时近两个小时，这段路，道窄、弯急、坡陡，异常危险。好在景区有上百辆中巴车供游人使用，外来车辆一律禁行，司机熟悉路况，经验丰富，拉着我们向山顶驶去。左边是刀削斧砍般的峭壁紧贴车身，右边是万丈深渊深不见底，司机熟练地手握方向盘，在山路转弯处频频掉转车头。盘山公路峰回路转，一百八十度急弯此消彼长，像舞动的丝带缠绕在山上，一个弯接着一个弯，连绵不断，层层叠起，直冲山顶。我坐在车的后排，不时屏住呼吸，每到险处总感觉车身如蛇蝎摆尾般不停地变换方向，时而车头悬出路基，时而与对面汽车擦身而过，紧张的心不由得提到了嗓子眼，林密山高，沟深车急，两眼直视着前方，惊恐之中早忘了观赏两边风景。汽车在山路上盘旋蛇行，司机像追赶猎物一般，一个劲地回旋扭转，快速奔驶，车身摇来晃去，乘客东倒西歪。还没登山，光是路上，我们已经领教了太白山的险峻。

毛泽东当年游庐山，留下了“越上葱茏四百旋”，“浪下三吴起白烟”的诗句，以形容山路难行，左盘右旋。其实，庐山盘山道的险峻还比不上太白山，庐山最高不过海拔一千四百七十四米，不及太白山顶峰三千七百七十一米的一半，况且庐山的山路呈螺旋式上升，盘山体而上，S形的山路已叫人心惊肉跳了，而太白山则是依山坡修建的Z字形，弯急路窄，逶迤绵延，车开出一段就要急转掉头，攀爬、折转，再攀爬，再折转，几经迂回，反复蛇行，据说要拐二十八个近一百八十度的大急弯。

车到中途停下，人们纷纷下车活动。站在路边，回身一望，一座巨大无比的石崖耸立在身后，导游称这是著名的景点“铜墙铁壁”。崖体似刀削斧砍般直立，拔地而起。“铜墙铁壁”高宽在百米左右，恢宏雄伟，气势磅礴，整块巨石看不到裂缝和坑洼，平平整整，只有雨水冲刷和自然风化形成的石锈，组成一幅幅天然的水墨画，黝黑嶙峋，斑驳幽暗。导游兴奋地指给众人，你看像不像鲲鹏展翅，像不像鱼跃龙门，像不像……这类说辞，见多不怪，每个人观赏景物的角度不同，感受不同。大山无言，不减风采，旁人聒噪附会，反而会倒人胃口。参观游览，开心就好，像什么，不像什么，姑且听之，不必认真。

车到下板寺，这里是攀登太白山顶峰的起点站，海拔两千八百多米，一路蛇行盘旋，还没有游山，多数人已感到头昏恶心，略感不适。从下板寺低首俯瞰，连绵数里的盘山路掩映在一片苍茫的绿色之中，像一条蟠龙蛰伏山坡，做升天之势，蜿蜒屈曲，荡气回肠，气势巍峨，极为壮观。太白山二十八段盘山险路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点缀，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，“太白蟠龙”不失为太白山一道新的景致，令人难忘，令人惊叹！

下板寺位于东西两座山梁上的一个缓坡，如今已没有寺院，只是留了个地名，建有游客服务中心、停车场、餐厅、索道等服务设施，从这里徒步到上板寺还有大约三个小时的路程，乘索道当然要便捷得多，四百多米的落差仅需十五分钟左右。稍事休息，我们便乘索道来到海拔三千三百多米处的上板寺。这里是山峰之间的垭口，距离三千七百七十一米的顶峰拔仙台，要绕行十三公里才能到达，即便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往返也要六七个小时，况且还会有较重的高山反应。从上板寺开始，脚下便像灌了铅一样，每上一步都气喘如牛。这时，山上飘起细微的雪花，让我真切地领略了一日历四季，十里不同天的万般奇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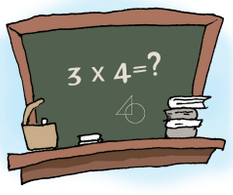
太白山的景点众多，千年冰洞、天池明珠、太白积雪、平安云海等等。其中最美的景致据说在主峰拔仙台，又名八仙台。传说当年武王伐纣后姜子牙封神点仙就在这个地方。太白山的魅力还在于它是一座历史悠久、积淀深厚的文化名山，东晋以前就是道教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洞天（德元洞天），为人间仙境，道士修炼之所。唐宋以来，许多文人名士都曾到过太白山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岑参、韩愈、苏轼等人，曾多次登临太白山，吟诗作画。唐代著名医药学家“药王”孙思邈，也曾长年隐居山中，研究草药为民治病。正因为这些文人骚客的亲访，让太白山的文化底蕴厚重起来。可惜的是，这些历史遗存，人们挖掘得还不够，毕竟太白山的开发还处在初始阶段。

景区历来有人文、自然之别，各有各的好。但是游山玩水，还是原始天然的好，城市里假山假水还少吗？何必跑到别处去看。即使太白山也有不少人文景观，但总觉得最好看的还是山的本身。山以高大雄奇为美，因为高，落差大，地形和气候条件复杂，容易形成垂直分布的植物生态和繁复多样的生物类群，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赋予了太白山独特的神韵。山高谷深，路险石峭，溪清潭碧，林茂水秀，峰峦叠嶂，石径萦回，这一切都让人流连忘返。

太白山的美需要细心体味，它也险、也奇、也秀，但我以为都算不上是它的特色，泰山之雄、华山之险、衡山之秀、恒山之奇、嵩山之绝，早已闻名于世，与那些名山相比，太白山的优势在于它的孤高独秀，冠盖群峰，其主峰拔仙台三千七百七十一米，不仅是我国大陆东部最高的山峰，也应该是适合内地普通旅客攀爬的最高峰，其他高山超过五千五百米海拔，一般人难以企及，只能望而却步了。太白山如深山隐士，深闺处子，藏而不露，声名不彰，这次重出江湖，必将辉煌再现！

老师

卢江良



一次周日聚餐期间，文友周勇说，明天晚上，要请一位远道而来的老师吃饭，问我能不能一起聚一下？因儿子学校安排八九两个学年夜学，我周一到周五每晚负责接他回家，没时间出席这类聚餐。我刚要谢绝，文友突然讲起了跟那位老师的往事：有一次，他在她的课堂上写作文，被发现了，老师没收了他的作文簿。

课后，她把他叫到办公室。文友以为，老师一定会狠狠地训他一顿，但没想到的是，老师非但不训，还夸奖了他，说他写的作文蛮不错的，并鼓励他以后要好好写作。就这样，启发了文友的文学梦想，使他后来成为了一名作家。

听了文友周勇的讲述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，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的邀约。

因为这件事，我也想到了自己以前的几位老师。第一位，是我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的数学老师，叫丁永祥。当时，他来教我们的时候很年轻，我们叫他“小丁老师”。因为还没结婚，丁老师住在小学附近的一间小屋里。每天晚上放学，他总会召集我们班的一些学生，到他的小屋里，给我们辅导数学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农村孩子的学业没现在这般繁重，从没上过“课外辅导”，丁老师算是开了先河。当然，他的辅导是纯义务的。这位小丁老师，尽管只教了我一个学期，但在我的心目里，他是最好的老师之一。

迄今，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，即便后来他成了中学教师，但在我二十五岁后，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。

还有一位老师，是我高二上学期的语文老师，叫董铭杰。我在2016年写的一篇散文《写作路上的“明灯”》中，曾专门写到他——他毕业于浙师大中文系，还在读高中的时候，就在《浙江日报》发表诗歌和散文。他来教我们语文之前，我每次写的作文——议论文，总被高一的语文老师批为“乱七八糟”，但他认为我的观点“别出心裁”，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，让我从此立志成为一名作家。虽然董老师后来弃教从政又下海，但在我三十多岁后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，特别在我2010年兼任《国家湿地》执行主编起，他还成了忠实的特约作者，每期为杂志写稿，直至2016年因病离世。

我还想起儿子小学时的班主任陈咏梅老师。在儿子刚进她的班级时，她见他长得特别瘦小，颇为他的健康担忧，便时时观察他的行动。之后，宽慰地对我妻子说：“卢聪玩耍时，勇猛有力，很健康。”后来，她又发现我儿子偏食厉害，除了瘦肉和鱼，几乎不吃其他蔬菜，学校提供的午餐，他差不多都是倒掉的。因为担心我儿子的营养跟不上，她便建议我妻子，每天的午餐在家里做好带去学校。我记得，在儿子入学不久，我去参加过一次家长会，她当着全班家长的面说：“虽然我只是一名小学老师，但我自认为是一名教育家。”对儿子六年的教育，我认为她确实无愧于“教育家”这个称号。

唐朝文学家韩愈在《师说》里说，“师者”是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人。但我觉得一位真正优秀的老师，除了“传道授业解惑”，还需要用“人性的温度”，去温暖每一位学生的心灵。像文友周勇的那位老师，虽然我现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，尚不知道她到底是他哪个阶段的老师，也不知道教过他哪门课，但这些都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的“宽容”和“鼓励”，温暖过周勇的心灵；再说我的丁永祥老师和董铭杰老师，还有儿子小学班主任陈咏梅老师，他们的课教得如何，对于现在的我和儿子而言，也都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曾经的那种奉献、认可和关爱，至今仍时时温暖着我们的心灵。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二七期